

陕西文史资料

目 录

· 政 治 ·

- 抗战八年西安生活的鳞爪 马凌甫 (1)
- 蒋鼎文主陕时期的陕西省政 朱在勤 (31)
- 对熊斌在陕西期间的见闻 辜达岸 (41)

· 军 事 ·

- 南路军始末 王捷三 (71)

· 经 济 ·

- 回忆从兴华采木厂到太白林业局的林业生产
..... 吴义学 乔完成 (82)
- 云开锦绣
一记太白林业局局长麻世芳 何永林 (109)
- 脚 印
一记太白林业局党委书记刘恩龙 刘耀武 (119)
- 中国棉业公司福生庄抗战期间经营
陕棉业务的回忆 夏少泉等 (133)

1989年8月 总第23辑

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	胡伯益 (149)
解放前西安市的粮食业	西安市工商联 (172)
解放前西安市西药业简介	剧位亭 (192)
解放前西安的煤油业	郭敬仪 (204)
镖局与镖客	
一陕西镖局的设立到结束	庞建堂 (216)
解放前西安市商会、同业公会概况	
.....	工商经济史料组 (232)
延安地区史略与水利水保概况	
.....	陈 靖 张永顺 (259)

抗战八年西安生活的鳞爪

马 凌 甫

抗战八年我是生活在西安的，当时西安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国内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生活在西安的人，对于当时阶级矛盾的现象，接触的比较，因而认识得也很清楚。当时流行着一副联语是：“国家政令出重庆，人民心理向延安”，这都可以说明社会思想的情况了。兹为提供史料，就我所知道或亲身经历的几段事实，拉拉杂杂地把它写出来，藉供参考。

一

自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侵略战争，至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请求无条件投降，整整八年零一个月，我全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保障民族独立，牺牲的生命财产，直不可以数计，西安在抗日问题上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向采取不抵抗主义，他的实力是用着对内镇压人民维护他的法西斯反动政权的。当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在江西“剿共”，陷于泥坑而不能自拔，便令张学良放弃沈阳，退入关内，日本不战而占领我东北数省，全国人民激于义愤，反日爱国运动，达到高潮，蒋介石遭到人民的反对，曾一度通电下野。不久又同

汪精卫勾结起来，共同登台，汪主政治，蒋主军事，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在南昌设立行营，为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时“御驾亲征”的机构。但是外来的侵略越来越厉害，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就越来越迅速。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经过一年的时间，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又调集大军，进入陕西，西安便成为国内阶级矛盾中心了。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部队剿共的军心和士气。驻在西安的杨虎城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关系虽各不同，但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蒋介石对张、杨这一主张，不但不加考虑，反而蛮横地加以斥责与压力，终于演出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把蒋介石扣留于西安。在事变发生之前，张、杨已先和延安方面建立了联系，结果以蒋介石承认抗日为条件，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初步基础。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正式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称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寇作战。但蒋介石仍不放弃反共目的。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派胡宗南驻兵西安，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封锁。为阻挠全国各地青年投奔延安，胡宗南在宝鸡设有青年学生辅导处，在西安设有劳动营和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在兰州设有西北干部训练团。对军事教育，在王曲设有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在翠华山设有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包围陕甘宁边区，除了强征民工筑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并以庞大的兵力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带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和坚壁清

野。为了防止西北各地人民起义，在陕甘宁青全面施行联保连坐。凡剿共省分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政令，都在西北认真实行。西安自抗战开始至1949年解放时止，就是在号称西北王胡宗南的“犖犖”之下，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最近我回了一次西安，看到解放十五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使人有沧桑之感。

二

“七七”事变前的两个月，安徽省政府改组，我调任行政院参议，5月初交卸安徽民政厅长，同时将代理主席职务移交新任主席刘尚清。到了南京，参议原是一个领薪不办事的闲散人员，行政院长王宠惠却要我到院办公，那时行政院正在准备组织一个规模宏大的视察团，分赴各省视察，打算安排我在视察团负相当任务，就让我每日到院做些筹备工作。“七七”事变发生，此事因之搁浅。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抗战，下令疏散职工眷属，我就在9月初送眷回西安，并没有打算在西安久住。不料南京于12月13日被日寇占领，把我多年来收藏的大部书籍，如图书集成、九通、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还有许多外文书籍，都随着南京沦陷而散失。但在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情况下，这些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我回到西安，最初寄居在中山门内华洋义赈会新建的房屋。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铭三）见我回不去南京，就在行营给了我一个设计委员名义。陕西省政府主席是孙蔚如，杜斌丞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他对国民党的政治向不满意。多年前他同王复初到山西运城小住，那时我住家运城，曾经交换过多次意

见，他见我回来很高兴，鼓励我参加动员工作。他说：“你这几年在安徽搞的还不错，不过在我看来，把国家命运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是靠不住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侵略战争，非依靠人民群众作长期抵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时西安正在成立动员委员会，由地方人士分赴各县，动员人民发挥抗战力量。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也是我能够做的，于是便趁着春节回了一次邵阳。路过渭南，县长崔孟博刚接事，邀我到县署休息，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对我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政府总害怕人民力量壮大，不便控制，不敢放手发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在渭南没有久留，晚间到了大荔，县长聂雨润（滋轩）安排我住在县署，他说：“你来的很凑巧，明日正是这里召集各乡农民代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期会，就请你届时出席为群众讲话，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是动员人民抗日的，当然乐于参加。在会场看到自乡下而来的农民群众，虽灰尘满面，但精神饱满。我一提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全场显示出无比的愤恨，对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肆行南京大屠杀，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事后我感到参加这次大会，不是我动员了人民，而是人民动员了我。聂县长还要留我多住几日，但是我要趁春节回邵阳的，他就替我借了一辆小汽车，我记得是旧历12月27日回到家乡，汽车一进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观看。但彼此大多互不相识，真是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摧。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慨。当时邵阳县长是苏资琛，驻军长官是李兴中。他们约我住在县城。我就先到城内同他们谈了些动员工作，因为春节期间，机关学校都在休假，并且我的动员对象是农民，于是仍回村舍，借亲友往来拜节的机

会，同他们多见面，并利用新春各种娱乐活动，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原有的形式上注入些目前现实的材料，这对宣传工作是十分有利的。按照农村习惯，春节初一至元宵节的半个月内，大一点的村庄，或是白天扮演故事，或是夜间跑船走马，有些村庄还有所谓“自乐班”的业余剧团在春节开演，名曰“杂戏”。我就和他们研究临时排演些新的剧目，他们练习得很快，多是随排随演。有一次我在邻村看到新排骂伪组织的几幕话剧，对于汉奸们那些丑恶嘴脸，刻画得形态逼真，惟妙惟肖。看完之后，我深切体会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怎样的事实，就有怎样的认识，也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动态把它表现出来。在戏台的明柱上写着一副对联，我觉得也很有意致。联语是：“活鬼乱当家，倘廉耻犹存，似此类妖孽，应该愧死；群魔徒害国，使法律有效，看这些东西，如何下场。”

我本来是回家动员群众的，看到农民抗战情绪这样高涨，更给我以莫大的鼓舞。为了扩大宣传，我就每日藉着探亲访友，四出游行。当然我所接触的乡亲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说服力很大，当时还不习惯写标语，多用联语表达自己的意志，我在各处看到的很多。兹记数则于后：

寇势正猖狂，愿人人戮力同心，为整个民族求解放；
国忧方严重，望家家节衣缩食，从长期抗战谋复兴。
世界趋大同，必摧毁侵略阵营，民族始有解放日；
国际崇公理，能树起和平堡垒，倭奴会到覆亡时。
国事正艰难，痛念外侮凭陵，当矢敌忾同仇志；
秦俗乐战斗，回溯先民典范，毋忘车辚铁风。

我在家乡住了两个多月，走的村庄很多，接触面也很广。有一次我到露井镇探亲，适逢集日，有不少昔年同学来赶会，听说我来了，都赶来和我见面。有一位研究历史的老同学，用今昔对比表示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中国今天的形势，我看和宋代差不多，宋自徽、钦被虏，高宗南渡以后，金人在北方先立张邦昌为楚，后又立刘豫为齐，敌伪纷存，几无一片干净土。南宋王朝岳飞力战，百代流芳，秦桧主和，万年遗臭。人们读史，对于古人的功罪是非，明若观火，一旦事到临头，就迷失了方向。自日本侵华以来，满洲伪政权，华北伪组织，仍扮演着傀儡戏，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退守武汉，闻也有人暗地主和，这不是和南宋同一类型吗？”他这些话，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由郃阳回西安，已经是1938年的3月了，这时西安已有敌机不时飞扰，有时轰炸也很厉害。有一次，我的住所近旁曾落过几颗燃烧弹，避在防空沟里的人，都被炸裂的尘土所掩盖，幸而落弹处距离稍远，人未受伤。城内居民每日为避敌机轰炸，黎明就携带干粮，出城躲避，至晚始归。政府鉴于局势紧张，暗中便作放弃西安的准备。当时蒋介石左右有些新从德国回来的法西斯信徒，如酆悌之流，大倡“焦土抗战”的谬论，凡是不能固守或者不愿固守的地方，决不能以一人一物资敌，在放弃之先，必须做好准备，能搬动的物资，尽量运走，不能运或者不及运的，临走时付之一炬。人民因无生活资料，就不能不跟着政府后迁。政府曾经一度把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排列次序，拟先分批送至汉中，当时已经送走一批。我也作了准备，曾把一部分眷属安置在郿县近山的地方。后因战局稍稳，停止再送。但敌机不断袭扰，跑警报便成了西安市人民的日常

生活。我为避免朝出晚归的麻烦，就在东关南城根自己原有的空地上靠崖打了几个窑洞，每日全家到此躲避。日子长了，我又打了两眼井，筑了一围墙，盖了几间小屋，索性把全家移住这里，名曰“莘庄”，这就是抗战八年我在西安的生活根据地。因为那时我没有担任政府实际工作，就把种树栽花作为我的日常事务。后来果树成林，花草满径，取自力更生之义，遂以“更生”名园，而自号“自力子”。

三

蒋介石对“双十二”事变，夙恨未忘，西安局势稍稳，便首先改组陕西省政府，调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代替孙蔚如。西安行营改为办公厅，以熊斌为主任，以民政厅长彭昭贤（君颐）为省政府秘书长，代替杜斌丞，留任杜斌丞为委员，而以CC分子王德溥任民政厅长。王捷三在这次改组时被任为教育厅长，代替了周伯敏。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改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次陕西省政改，蒋介石却视为极关重要了。

蒋鼎文接主席后，为培养基层干部，首先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行政人员训练班，不时邀我为学员作所谓精神讲话，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每次总是胡拉乱扯，多涉及社会经济情况，他们听了不像精神讲话，就送了我一副联语，上联是“发行国民经济”，下联是“出售工业政策”。因为我曾有国民经济学原论和工业政策两书出版，故以此向我开玩笑。那时抗战军兴，已经近两年了。东半壁河山，大部沦陷，官僚资本和富商大贾在沿海一带或沦陷区各大城市所经营的工厂商行，都迁移后方作经济游击，西安市面反呈现出虚假的繁荣。但是前方一

切军需供应，也加重在后方人民的头上，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对人民提出的要求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于是徭役繁兴，催科人员，塞满道路，冗员多，待遇薄，所得薪俸，因物价增高猛涨，有时连伙食也不敷开支，舞弊营私，相习成为风气。乡镇保甲，又复互相勾结，鱼肉乡里，人民受其压迫，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训练班学员结业，蒋鼎文请了些地方人士包括我在内参加典礼，轮到来宾讲话时，大家都不肯讲，我看那些学员都是要到各地同人民直接发生关系的，就代表来宾讲了几句话，我说：“抗战军兴，国家对人民的要求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两句是以‘有’为前提，若一次举其所有，竭泽而渔，则无法支持长期抗战的需要，因此人力物力必须加意培养，能保留更生余地，才能取之不尽，对于人民所出之力所出之钱，必须做到力不妄用，钱不虚糜，才能用之不竭。但是各地情形，大都与此相反，征夫拉车，摊粮派草，漫无限制，壮丁集合无常，运输工具长期扣押不放，保甲人员、下级干部暗中勒索，朋比为奸，长此下去，人民将无力无钱可出了。”我讲完后，蒋鼎文很表赞同，但这不过是表面，内心里恐总觉得这些话不符合他的要求。

1939年夏，陕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议长是宋联奎（菊坞），参议员名额，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任期是一年，开会两次。我连任一年，开了四次会，但对人民并无贡献，殊觉惭愧。这时蒋介石在西安设天水行营，以程潜为主任。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6月6日，日寇陷开封，蒋介石为了保卫武汉，阻止敌人西进，竟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密令前方部队在花园口决开黄河堤岸，制造了54000平方公里的黄泛区，程潜在洛阳奉命督饬进行，结果未能阻止敌人西犯，武汉于10月25

日弃而不守，程潜辞职，蒋介石就给他以天水行营主任。天水在甘肃，行营设西安，名实就有点不符。蒋鼎文、胡宗南对程表面上很尊重，遇事却暗中掣肘，连行营挂招牌的地方也找不到适当的场所。程潜到了西安，先在五岳庙旧关中道署原系张聚庭私人的住宅办公，后来才迁移到东厅门西安高中的地址，这时学校已疏散到洋县去了。这里房屋虽多，目标甚大，防空设备只挖了一道狭长的深沟，并未构筑坚固工事，有一次敌机轰炸，炸弹正投在防空沟口，躲在防空沟里的人，因沟口被土壅塞，空气不通，窒息数十人（确数已记不清楚）。程潜因避入在后，抢救在先，幸获复苏。这些殉职人员，公葬于翠华山，称烈士焉。

天水行营在西安实际上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构。中央直属部队完全控制在胡宗南手里，关于西北大后方的一切安置，蒋介石都倚靠了胡宗南。西安又有以熊斌为主任由西安行营缩小的办公厅，更显得天水行营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骈枝机构，但名义却包括西北各省。程潜为了充实抗战力量，对甘、宁、青进行联系，就在武功西北农学院邀请了专家教授多人，组织西北实业考察团，由陕西到甘肃、青海、宁夏考察农田、水利、森林、畜牧。因我生长西北，向有致力于西北经济文化之夙愿（我在北平任平民大学校长时曾组织西北研究社，发行有西北研究月刊，辛亥革命时倡办西北大学），就让我担任团长，并由天水行营给了我一个参事名义，我就衔着行营使命偕同农学院教授周昌云、余立基、夏受虞、常英瑜、吴信德、董涵荣、黄志尚等于1939年8月24日，由西安乘西兰公路长途汽车出发。由于车辆机件太坏，一路故障层出不穷，27日过六盘山，适遇大批汽车满载飞机零件及军需用品，运往重庆。为了

让路，我们的车子在海拔2500公尺的山顶上足足停驶了两个多小时，藉此机会，我们就登峰造极，东望秦川，西望陇右，真有目穷千里之概。毛泽东“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诗就是在这里写的。过了六盘山，刚到静宁，汽车又坏了，司机说这次事故较大，修理需时，让我们暂住，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就地便进行调查研究。各教授说，陇东山地适于畜牧，不宜森林，这完全基于土壤的关系。根据客观事实，终南、太白等山，佳木成林；陇东诸山，俱是绿草铺地，这就是显明的事实。在陇东住了一天，车修好了，继续开行，29日才到兰州。

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一民）到青海代表中央主祭海典礼去了。省政府秘书长翁燕翼为我们安排了参观程序，建设厅长李世军在省府招待会上又把甘肃建设计划作了一次详细报告。我们按照程序，参观了农业改进所、手工业推广所等许多机关，最使人注意的是制造厂、造币厂和军政部第一织呢分厂，这些厂都是左宗棠在60年前创办的，初不过为修理枪炮，逐渐扩充，现在制造厂只能造七九步枪，产量不高，品质为材料所限，亦不甚优；造币厂只造一分铜币，产量也不大。惟军政部第一织呢分厂规模较大，每月可出军毯两万条，每条成本约七元之谱。正在忙着参观，朱绍良于9月3日从青海回来了，当日就约我到省府谈话，我先请他对我们调查研究工作多加指导。他说在考察团未来之前，我早就通知各县，在你们工作上充分予以便利，提供材料。我在青海还同马子香（马步芳别号）谈过，对你们到边疆省分来一趟，都很欢迎。接着他看报载德国于9月1日对波兰边境，全线开始敌对行为。他说：

“欧洲战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你看对中国有何影响？”我说当

然与中国有利，因为中日战争原来就是世界大战的序幕，非经过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不能结束。非通过战后国际会议，中日问题不能解决，战局愈扩大，发动愈早，我认为对中国抗战前途却有好处。他很同意我的看法。并为我介绍青海人民的生活习惯。我们于9月8日离开兰州，赴西宁。西宁原为甘肃的府城，1929年青海建省时，划为青海的省会，沿途由于汽车时生故障，9月11日才到西宁。

马步芳是青海省政府主席，对青海人民直以封建式的家长自居。关于他在政治上的措施，不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因而在省政府为我们安排参观程序和考察路线时，各教授都说青海四分之三的面积属于游牧区域，其人民多系蒙藏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内地大有不同。为了有所创获，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进行调查研究。于是决定分为两组：一组是周昌云、常英瑜、吴信德，其路线拟由湟源经都兰穿过柴达木盆地达敦煌，由敦煌返兰州；一组是余立基、夏受虞、董涵荣、黄志尚，我也参加在这一组，其路线是，先赴大通、互助、门源、八宝等县，仍返西宁，再由西宁赴共和、贵德、化隆、循化等县，取道临夏（原名河州，因其地临大夏河，故改今名，系甘肃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驻在地）返兰州。预计两组途次日程，均须三旬左右。时间有限，宁夏之行，只好俟诸异日。决定之后，9月19日就分途出发，于10月13日都在兰州集合回西安，所有考察所得，各教授在科学技术方面，集体作了一分详细报告，因天水行营于1940年5月奉令撤销，未能见诸实施。关于青海一般情况，我曾印有青海调查报告，供留心西北人士的参考。

我在西宁住了上十天，马步芳除在省府召集有关方面向我

们汇报情况外，有一天约我到他的别墅，很客气地问我¹对青海省政有何意见。我说：这几天我们看到的都是省政中心工作，我感到都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尤其是对于壮丁训练，特别认真。我这句话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他说：白部长（指白崇禧）去年到青海来。对我谈广西训练壮丁的办法，我感到很适合于青海，就把它列为六大中心工作的首要，实行以后，没有受过训的壮丁，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由该地强迫施训。因此，受训证在青海人民看来，就是一种通行证，为了取得一纸证明，对受训都不敢规避。但在编组工作，与保甲有连带关系。青海游牧区域，人民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这一点比较困难。我问六大中心工作为什么不包括水利？他说，青海河流甚多，无水不能灌田，雨量亦不缺，水旱田并没有多大差别。接着他说，蒙藏民族，对佛教有些迷信太过，喇嘛在社会上占有特殊优越地位，凡人家有数子，必送一子入寺为喇嘛，甚或其家只留一人，余均送入寺院，但一切生活费用，仍须由家中负担，死后还要把家中应分给他的资财收归寺有，这不但影响人民生计，且与种族繁殖有极大关系。近年因实行强迫教育，各寺喇嘛，其数锐减，有些寺活佛无法传授其衣钵，向乡间强派喇嘛，如拉夫征兵者然。省府已下令禁止，可见教育普及，迷信自破，我们把推广识字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就是为此。最后他说，地方情形，都很安定，就是都兰附近新来哈沙民族约三四万人，该族原隶苏联边境，因为不服苏联教育改造，被苏联用武力驱逐，经过新疆，盛世才又不相容，现全部来到青海，能否相安，不无顾虑，此事我已向中央报告矣。这是他和²我谈话最多的一次。

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为黄教鼻祖宗喀巴诞生的地方，也是到青海作客必游的名胜。有一天省政府秘书长陈耀堂陪我们去参

观，导游喇嘛告诉我们说，塔尔寺本名十万佛身寺，因宗喀巴大师圆寂后，其出生时埋藏胞衣的地方，生称旃檀树，树叶显有十万佛身，故以为名。我问旃檀树现在还有没有，他领我们到大殿参观，宗喀巴像后一塔，最高最大。他说宗喀巴大师出生的胞衣就埋在这个地方，后生旃檀树，年久树就凋残，乃建此塔以留纪念。一般以屋瓦系金色，故名金瓦寺。住有喇嘛3000余人，规模之大，西安各佛寺无可伦比。在寺内看到班禅生前所乘的马车，忽然触动我一种感想，自民初以来，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外倾，班禅内向，在1924年冬班禅入京，路过西安，曾在西安八仙庵停留过一个时期，那时我任陕西教育厅长。联欢会上，法会场中，曾经有过殊胜因缘。班禅住京数年，回藏途中，在玉树圆寂，法体送之西康，供于甘孜，其生前所用器物，则保存于塔尔寺。当时护送班禅回藏的专使是赵守钰（友琴），他宣慰西藏回来，在西安见我，谈及亦有同感。

我还记得到互助县时县长说，互助有却藏寺，为章嘉活佛的专刹。近年活佛驻锡北京雍和宫，很少回来。我又回忆在1936年9月初，章嘉活佛在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陪同下到九华山巡礼，山在安徽青阳县，那时我任安徽民政厅长，代表安徽省政府前往招待，在山盘桓多日，形迹颇不隔膜，到处拍照，兴致甚浓，临别他用黄缎亲书“功德在民”四字赠我留念。因此，我听到却藏寺，瞻乌及屋，就像有不同的感觉。

我这次到青海从西宁各界人士的谈话和到外县同人民群众的接触，使我在经济发展史上所看到的畜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情况，获得了感性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但是长途患痢疾，健康大受影响，主要是消化

不良，头脑昏晕，连纪念周都不能参加，因为站立的时间稍久，就会昏倒在地，后来端坐也有时发晕，往往在顷刻之间，不省人事，稍缓才能恢复知觉。医生说是慢性肠炎，很难医治。经怀仁医院吴霁棠院长负责治疗，一直到1940年冬天，才开始好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杜斌丞忽来莘庄，手里拿着王复初一封电报，内容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成立经济游击指挥处，处长由李自兼，副处长一席，约长承乏。斌丞力劝我去，我也愿去，但顾虑我的身体不能胜任，因而迟疑。次日拟了一电婉词推托，请斌丞代发，斌丞见我说，你来的正好，刚才老河口来电话，说经济游击指挥处急待成立，立候应允，我看你还是勉为一行吧，我替你复电报好了。从此我的心理上经常交织着两种不同的矛盾思想，时而想到我的身体，医生坚决不让操劳，时而又想到抗战建国人人有责，遇事不能为国宣勤，未免有负期许。推延多日，卒以足部浮肿不耐远行而罢。曹志麟原来相约一道前往，我行不果，他就先走一步，我的情况由他代达。未几李宗仁和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复电嘱我静养，并说经济游击指挥处已决定暂缓成立，俟我病愈到郾后再议。后来王鸿韶到西安，说抗战三年，物资供应，日感缺乏，军事第一，已转变为经济第一，各战区均有经济委员会，操奇运用，藉资补助，所以要成立经济游击指挥处，为的是向敌抢购物资。我未去，第五战区经济游击指挥处也未成立。

四

1941年8月陕西省政府又改组，熊斌任主席，秘书长是辜

仁发（达岸），民政厅长彭昭贤，财政厅长周介春，建设厅长凌勉之，教育厅长王捷三连任，还有五个委员是李志刚、马凌甫、刘楚材、刘治洲（定五），张迺威（警伯）。当时省政府设有垦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人，由主席兼任，民、财、建三厅长为当然委员，还有委员数人由主席聘任。在省府委员分工的时候，熊斌就给了我一张垦务委员的聘书，并指定我负责处理会务。垦荒在陕西当时是一种政治运动，自抗战军兴，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满人流亡，麇集西安。尤其在黄河决口以后，黄泛区灾民，更像潮水冲开闸门，蜂拥而至，据当时官方统计，为数约十万左右，实际决不止此。为了安辑流亡，陕西在抗战开始，就把开垦荒地，扩大农村耕地面积，视为重要问题之一。从1937年冬筹设黄龙山垦区以来，先后划定的垦区有：关中北边的马栏、汉南的黎坪、关中西部的汧山、太白山麓这五个垦区，全部荒地，据初步统计，约有500万亩。还有非正式垦区，如扶眉垦区，泾阳嵯峨山垦区，陇县杜阳垦区及各县未划垦区的零散荒地，合计约在200万亩以上，若能全部施垦，不但难民得到安置，且可奠定后方建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在1940年的行政计划里又把垦荒运动列为专案，并制定各县发动民力开垦荒地暂行办法。关于清查荒地、处理产权、分配收益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其目的在使各县大规模发动民力，增产粮食。除机关、团体、学校、保安团队等，动员人数及垦地亩数依可能范围另行规定外，凡荒地多、人口稠的县分须动员5000人，少者亦须动员2000人，按照规定亩数，分配荒地，组织垦荒队，用合作方式，进行开垦，寄养难民，就地参加。后因黄龙山垦区收归国营，黎坪垦区亦由中央派员筹办，汧山垦区划为省营，各县所垦的荒地，便称民营。但不管国营也